

目 录

文 献

-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瞿秋白(1)
湘鄂边风暴 贺 龙(11)

回 忆 录

- 关于朝鲜开城停战谈判的回忆 解 方(24)
回忆投身西藏和平解放的历程 乐于泓(40)
晋察冀边区党组织在战斗中成
长壮大 刘澜涛(82)

人 物 介 绍

- 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孔从洲(100)
何孟雄反对立三、王明路线的斗争 张祖柱(150)

专题资料

西藏和平解放始末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163)

新疆和平解放始末 朱培民 (188)

湖西“肃托事件”

..... 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212)

中共组织史资料

1927年至1937年间的中共陕西省委组织概况

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248)
 陕西省档案馆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瞿 秋 白

编者按：瞿秋白《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讲演，原刊于1925年12月20日出版的《中山主义》周刊第1期（现藏上海档案馆），由秦邦宪、崔小立记录整理。据朱时雨同志考证，这篇讲演系瞿秋白应上海大学中山主义研究会之邀而作，《中山主义》周刊即为该会会刊。秦邦宪、崔小立当时均为上海大学学生。讲演的时间为1925年12月8日。这篇讲演，在历年出版的有关瞿秋白的著译目录、文选、年谱、传记、史略等著作中均未收录和提及，是一篇新发现的珍贵史料。杨之华在《一个共产党人——瞿秋白》一文中说：“秋白不仅用文字进行繁重的理论斗争，而且进行口头的共产党的政策和共产主义的宣传，他作过好多次有力的生动的激动和说服人的讲演……”可惜这些讲演多数未能记录和保存下来，因此这篇讲演的发现更有其特别意义。《上海党史资料通

* 文中错别字后面用（ ）注上正字；漏字用〈 〉补上；次序颠倒或重复的字已作订正。

讯》1989年第1期刊发了这篇讲演，并作了文字订正。本刊现予转载。

今天我讲的这个“国民革命与阶级争斗”的题目，是现在我们大家所最注意的问题，也是全国人都注意的问题。而且这不单是学理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问题。有人说：国民革命是要各阶级联合的，这是不是事实。现在我们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为什么主张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赞成阶级争斗与反对阶级争斗的两派，这就不单是学理的问题，〈而〉是实际争斗的问题了。

在革命策源地的广东，这个问题尤其很明白的摆在我们面前：广东二三十万的工人，农民，与帝国主义者利害冲突，国民政府领导他们与帝国主义者奋斗。我们在〔从〕商团事体中，可以看出来，〔，〕因为商团所要推翻的不仅是国民政府，不仅是孙中山先生，而是要推倒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所谓商团，就是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陈廉伯与英国帝国主义者的香港政府互相勾结的一个攻打国民政府的工具。其次我们从五卅事件以来，可以明白的看出来：当我们一班学生工人在南京路上大流血以后，总商会不肯立即罢市，好容易磕头礼拜的求到罢市了〈，〉又不肯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到六国委员到上海的时候，马上把工商学联合会的条件修造了。这几点都是明白给帝国主义者知道：我们中国的高等华人，还很愿意受租界上领事的裁判，受武装海陆军的保护，更使帝国主义者屠杀不止，横行无忌；甚至如入无人之径〔境〕，开什么国际法庭重要的恶例。照以上的事实看来，我们试问国民革命，

是不是各阶级联合的？从总商会宣布开市，一直到总工会被封以后，学生会为查货的事，不知同他们闹了好久。总商会所豢养的保卫团，天天在压迫工人运动，禁止工人的集会。这是不是国民革命中的阶级争斗？有人说国民革命中是不应有阶级争斗的，那末我们更要问，譬如前天在闸北开市民反段大会，保卫队〔团〕以马队冲散游行队伍，甚至发〔开〕枪伤人，〔。〕从前外国巡捕打死我们的工人学生，我们就罢课、罢工、罢市反抗，现在保卫团来打我们了，难道我们可不反对，还要进一步说，这是对的吗？

国民革命是什么？我们先要问我们主张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什么。我们国民党有狠〔很〕鲜明的三个目标：1、要把全中国〔从〕被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2、要把〔从〕横暴的军阀官僚的手里夺到代表人民真正利益的政权；3、便〔使〕占全国十分之八以上的农工群众得到生活的改良，〔。〕这三点都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得狠〔很〕明白的。这三个目标，就是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一、民族主义 我们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象国家主义把〔的〕封建时代落伍的幻想所可完成的，并不是象法兰西的革命就是第三阶级把他们的贵族僧侣赶跑就算了。我们要知道现在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中国的一切经济政治的状况没有不受国际的影响，所以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不期然而然的要反对世上一切的资产阶级。孙中山先生所说：现在世界经济状况中所

发生的战争，不是人种间的战争，不是黄种人和白种人或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强〔理〕与强权的战争。所以我们国民党虽然主张收回海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等，表面上看来是仅仅我们中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如果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胜利就是我们全国民众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胜利。因为帝国主义者决不能以其失却市场或其他剥夺殖民地之权利，而不根本动摇。譬如英国若失去香港及中国之市场，还能安然立足吗？还有一点，我们国民党的民族问题，是要国内各种小民族一律平等，自由，联合成中华民国，所以我们国民革命，是站在全民众的观点上去反抗外国资本主义，而国民革命第一个目标——民族主义——就是代表全中国的民众与外国资本主义去实行阶级争斗。

二、民权主义 我们国民党是反对军阀政治，是要用全国人民的力量，造成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但这并不是党纲上这么写了一条就算了的事，一定要从实际上争斗的。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想一想，到底是我们同那〔哪〕个去争〈斗〉。因为军阀不肯给我们政权，所以我们要反对军阀，试问这是不是阶级争斗？当然是的，因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商团都一样的要摧残我们爱国运动。若果说我们要抛弃争斗，那就是抛弃民权，譬如以工会法的事体来说：广州已争到了可以获得工人自己的利益，而上海汉口天津等处还在争斗之中。一般大资本家，工厂主，大地主压迫工农阶级，我们就非去实行阶级争斗不可。若说这是共产党过激派的话，那我们就要问广州国

民党政府之下，究竟能不能允许工会的存在？许不许罢工的自由？若允许的，是不是允许阶级争斗？若是不允许的，岂不是违反民权？所以国民革命第二个目标也就是阶级争斗。

三、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的二大纲要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更明显更纯粹是一个阶级争斗了。孙中山先生说：资本主义之下，一定有阶级争斗，这争斗若要消灭，除非实行新共产主义。虽然孙先生也曾说中国患在贫而不患不均，但这是一方面的话，我们要消灭阶级争斗，就要实现民生主义。若说中国没有不均，孙中山又何必提倡平均呢？我们深一层说：国民党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代表那〔哪〕一阶级利益的？当然是代表农工阶级的。那般资本家大地主平均他们的地权，节制他们的资本，他们肯不肯？他们一定要反对国民党，那就要发生阶级争斗。在这方面看来，国民党只有反对资本家大地主及一切特殊阶级，只有替农工阶级去实行阶级争斗，才能实行民生主义。所以国民革命第三个目标，本身就是阶级争斗。

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国民革命是要站在阶级的地位上去实行阶级争斗的，三民主义就是阶级争斗三方面的表现。我们再举一二事证明就够了。譬如辛亥革命是反抗满清贵族的革命。但这个革命是失败了。他〔它〕何以失败呢？就是没有推倒帝国主义者及一切军阀士人夫阶级。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那时没有无产阶级参加。当时虽有无产阶级存在，〈但〉因为他们没有组织，没有党，农民也不知为自身利益而革命，所以在政治上，我们可以说没有

无产阶级。反〔及〕至五四运动，因为这几年来中国稍有工业的发展，所以也就有工人运动的发生，而国民革命就有新的发展。自从二七事〔件〕以至今年五卅事〔件〕。〔，〕中间经过广州商团之役，沙面的罢工，上海，汉口，青岛等地的罢工运动，都是阶级争斗的表现。这种表现是不是破坏国民革命？绝对不是的。譬如青岛的罢工，引起上海的五卅事〔件〕，有了五卅事〔件〕，国民革命的力量，就有充分的表现。因为五卅的要求条件中，一方面要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等，是反抗帝国主义，也是全中国人民的阶级争斗；一方面要求工人有集会罢工之自由，这当然是阶级争斗。〔，〕更是国民革命，因为没有工会，工人就不能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争斗。

近来工人都明了自己所处地位，农工也有好几处同大地主争斗。这许多阶级争斗在辛亥革命时〈是〉没有的，现在有了。在种种阶级争斗中明白了他们自己与帝国主义者买办阶级军阀官僚大地主相对的利害关系，使国民革命中工农阶级成为重要基础。所以中国革命党真正要实现三民主义，非领导他们去实行阶级争斗不可，〔。〕在实际上看起来：阶级争斗不但不破坏国民革命，而且使国民革命发展。在理论上我们如果反对阶级争斗，就无异抛弃三民主义，而又反〈对〉国民革命，〔。〕除非是以国民革命作口头禅的政客才会说不要阶级争斗。

我们国民党中为什么会分出两种现象？我们先要看帝国主义者侵略我们中国的方法，用不平等条约束缚我们，

用外交手段召集什么华盛顿会议，关税会议。但是这些方法太〔太〕明显了，还有很巧妙的利用中国军阀供给军火，或利用研究系及国家主义者，天天的反对赤化的论调。但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势力依旧高涨，显见得这些方法又无用了。现在就有一种最新最利〔厉〕害的方法，就是使国民党内部分裂，有反对阶级争斗反对共产的争执，这么一来，就使左派革命的力量分散了，要拿一部分力量来对付右派反动的行为。这是五卅运动的结果，也是国民革命的结果，这没有别的方法可解释的，因为这也是阶级争斗。

我们国民党是主张联合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及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者用什么方法可以打破这联合战线呢？最好就是〈反对〉阶级争斗的论调。因为这一来就可反对联俄，反对一切外国人，不管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使中国的国民革命，减少力量而不至于完全。虽然党中有一部分右派分子不曾有这样明白的表示，提出什么骗人的民族国际，而一样反对共产党，尤其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为阶级争斗是妨碍国民革命的。但我们试看广州国民政府，允许工人结社罢工之自由，人民入党的自由，共产党可以存在，因革命的手段相同，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因阶级争斗而国民革命有长足的进步，帝国主义自然很嫌恶了。而在上海就不然了，帝国主义者命令戒严司令部把工会一概查封，雇潘冬林这些人去做工人御用的领袖。这个热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就狠〔很〕容易的解决了。我们在这一个观点上来着〔看〕，反对阶级争斗，反

对共产党，除了帝国主义者和段祺瑞，张作霖以外，还是〔有〕谁得着利益呢？于国民更有什么好处呢？并且这些右派所谓反对阶级争斗，不但理论上站在帝国主义的观点上，而事实上完全帮助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他们居然在北京开了他们所谓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们且不就纪律上说：如中央执行委员会须由秘书处召集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须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举行等等；且在政治的意义上说，在开会以前，林森〈、〉邹鲁电汪精卫谓广州执行委员，违反孙先生的联北主义，而他们现在居然联络段祺瑞在北京开会，这是不是实行中山主义？这不是表示反革命是什么？后来他们通电开除共产党〈员〉党籍，国民党如何可以越权开除共产党员党籍？又以中央执行委员开除中央执行委员岂非笑话？甚至开除汪精卫党籍，且不准在国民政府行政范围内，行施〔使〕职权。我们试问汪精卫那〔哪〕一点违背党纲？那〔哪〕一点对不起广东人民？他们都不曾说出。我敢说广州的工农群众没有一个要汪精卫走；要汪精卫走的是谁呢？是帝国主义者，段祺瑞，张作霖。照他们这种举动，事实上帮助了帝国主义者向中国的工农阶级进攻。他们谁〔虽〕然说反对阶级争斗，不知他们自身在实行阶级争斗，〔。〕

现在国民党的发展与国民革命之伸张并进。我们再试看五卅事件之阶级争斗中，国民党员在广州增加了二三十万的农工的党员。戴季陶说共产党破坏国民党，阶级争斗打破国民革命，岂非笑话。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要三民主义的实现，只存〔有〕在实行阶级争斗，领导全中国被压

迫的民众，与帝国主义者奋斗；（民族主义）在〔从〕军阀官僚及特殊阶级的手里，争到代表人民真正利益的政权；（民权主义）为农工阶级保障生活的安全与自由，与大资本家工厂主大地主去领导〔进行〕阶级争斗（民生主义）。

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完全为国民革命主要的力量。在五卅事件中，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我们要把主义变成事实。如果没有这主要的力量，国民革命永不能发展而至完成。所以所〔我〕们要做真正中山主义的信徒，革命的国民党员，除了担负上述三种责任以外，又要加了一种攻击右派反动分子的责任。因为右派这种反对阶级争斗，开除汪精卫，开除共产党等政策，一件件都要使国民党失了工农群众的信仰。我们只简单的说，工农群众是否需要阶级争斗，改善他们生活的状况；〔。〕现在的阶级争斗，还只是加资减租等运动，国民党若反对阶级争斗，自然都象戴季陶所说去诱发资本家地主的仁爱，结果工农群众就是全失了同情。若以反对阶级争斗开除共产党，那共产党人一出外去宣传国民党反对阶级争斗的主张，抹杀农工的利益，国民党那〔哪〕里还有工农阶级的存在？国民党还有什么力量？所以为国民革命计，尤其为国民党前途计，不得不对右派反动分子宣战。我们更应该认定这也是国民党工作之一部〔份〕，是国民革命之第一步。

我们分析他们的政策，已完全表现了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他们的理论，尽管怎样高妙，说什么哲学基础；孙中山先生是继孔子之道统的；因为仁爱，所以不

主张阶级争斗。但我们试问孙先生革命，是不是争斗？创设同盟会，是不是要争斗？再问什么人可以施仁爱？对资本家，地主，军阀可以施仁爱吗？〔对〕压迫者可以施仁爱吗？在这点，右派居然把革命的中山主义与贤人政治相混淆，把中山先生〈当〉做封建时代的孔徒，使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变成劝圣主行仁政的保皇党。何等荒谬！中山先生确有种种道德，可是他是一个革命的领袖，绝不是希望他去行仁政。譬如上海小沙渡或杨树浦各工厂罢工的时候，一方面是资本家，一方面是工人，国民党如果反对阶级争斗，应该站在那〔哪〕一边呢？工人一边吗？赞成阶级争斗了；不然，那就被资本家利用去欺骗工人做了一个工贼。所以我们如果站在革命的地位而讲仁爱便是不通。

总之，我们要研究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就应当去实行阶级争斗；使全国的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国民革命才可以成功。对于党中的右派，我们就不能不取革命的行动，施以严厉的攻击。因为国民革命而反对阶级争斗，自己不但不是国民党员，而且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我们希望每个中山主义者，真正的国民党党员，去实行阶级争斗而发展国民革命！

湘 鄂 边 风 暴*

贺 龙

在石首焦山河会议以后，我们于1928年2月底到湘鄂边去。途经连云溪、毛草街、张家湾等地，那里都住满了敌人。我们绕过他们，到了澧县境内，在一个村子里搞饭吃，留一个人在外面放哨。来了二三十个敌人抓鸡，我以为是来抓我们的，跑出去一看，敌人一个排长立正向我敬礼，原来他是我以前的一个部下。我问他干什么，他双脚立正，规规矩矩地回答说：“报告镇守使（大革命之前，我当过湖南澧州镇守使），我们来搞点东西。”我说：“我就住在这里，你们给我放哨，要保证我的安全。”这个排长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我们在他们的警戒之下，安安稳稳地吃好了饭，睡足了觉。到了湖南石门后，住在张海涛家里。本来准备会合石门党组织，此时才知道，石门党组织已经分裂了，一部分坚定分子继续革命，一部分动摇分子投敌叛变了。石门军事部长罗效之带部队投降了国民党，后来搞了1000多人，同我们斗争了10多年，最后在湖南常德

* 本文系由杨秀山同志于1978年11月根据贺龙生前谈话整理而成。

被国民党搞掉了，这是叛徒的下场。剩下的少数武装部队由曾庆轩同志带领，在石门南乡坚持斗争。我们由石门过东洋关，到了兹利的江垩，次日又到了竹叶坪。我们住在钟镇吾家，钟劝我回桑植时不要过空壳树，因为陈策勋住在那里，并且派了队伍拦截。我们便绕路经麦里坪回我的家乡——洪家关。在我到洪家关之前，我家里的亲戚、朋友和旧部下王炳南、刘玉阶、李青云、钟镇吾、谷志龙及我姐姐贺英等几十股武装正在打仗，自相火拚。我来后，他们还彼此不信任，实弹持枪。我说：“你们退下子弹，再不许打，都跟我干革命！”周逸群同志也向他们作宣传。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意见，愿意跟我们干。这样，共3000余人，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接着进桑植城，成立桑植县委，以李良耀为书记，打土豪，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成立苏维埃政权。

当时我们是有方针的：第一成立县委，发展组织；第二整编队伍。这两样都抓得很紧。此时，我的旧友王文轩来信要我去湖北鹤峰县走马坪会朱华生，搞了几千元钱和粮食。周逸群、贺锦斋留在桑植县。结果敌四十三军的龙毓仁旅来攻，在梨树垩、洪家关、苦竹坪等地打了3仗。我军由于刚刚集中，未来得及整理，所以没有打好，失败了。我和周逸群同志被敌人隔开，失去了联系。周逸群同志被迫转往石首、沔阳、江陵等地农村发动群众，搞武装斗争。他后来就在那里工作了，一直搞得很好。我从走马坪回来，会到贺锦斋、张一鸣、李良耀同志，经过商量，即往桑植、鹤峰边界的红土坪一带，收集失散的部队，集

中了三四百人，重新整理了队伍。当时部队上有些同志还骄傲自满，又受家族一条线的牵扯，很不利于我们武装斗争的坚持和发展。我对他们说：“要干就好好干，不下就走！”经过一番艰苦的工作，才挽救了局面。

桑植第一次失败，封建思想是主要原因。家族、亲戚、旧部下都是我个人号召来的，部队没有党的组织，不明白党的政策，不知道为谁打仗，很多人认为是给我一个人干的，想跟我升官发财。部队里若有党的组织和教育，有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就打不垮了。我们领导干部虽是共产党员，也代表了党，但很缺乏经验，部队中又缺乏骨干，因此经不起风波。

经过整顿，队伍就在桑植鹤峰边界一带活动。6月间敌龙毓仁部从桑植西撤，我带领部队在小埠头截住他的后卫部队，击毙敌参谋长张策，歼敌1个连，缴获了不少枪支和辎重。按当时的环境，本来可以重新夺取桑植县城的，但因部队分散，不能迅速集中，所以没有占领县城。但打了这一个胜仗，对部队鼓舞很大，一些原来失散的部队又陆续回来了，还有我的旧部下文南浦等带着队伍来参加红军。后来贺桂如、贺佩卿也带着队伍来了，使工农革命军又扩大到1500余人，然后队伍就到达桑植县内继续休整。此时，湘西特委派陈协平同志带来了湖南省委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在红军中成立党的湘西前敌委员会，以管辖红军和红军所在地区地方党的工作。前委由我、陈协平、李良耀、贺锦斋、张一鸣等同志组成，我任书记。同时召开了大会，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我任

军长，黄鳌同志任参谋长，下属第一师约七八百人，由贺锦斋任师长，张一鸣任党代表。此外还有文南浦、贺桂如、贺佩卿等人率领的几个支队、大队，约 700 人。从此我们的武装又出现了新的面貌。

红四军成立时，前委做了决定。我记得内容有：（一）将原有的部队逐步进行彻底的改造，加紧下级干部和士兵的训练工作，同时吸收进步士兵为党的中坚分子；（二）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动广大农民起来斗争；（三）红军滞留在桑植，政治影响太小，待子弹补充稍足时，必须进至石门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同时向常德取包围形势。在上述原则指导下，各级同志都行动起来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士兵党员同志发展到 40 人以上，一般士兵对土地革命的意义也有相当的了解，各种宣传标语布告遍布桑植县的内半县。

党的工作虽然有了起色，但不良倾向仍然存在。红军宣传队张贴的标语和布告，有的同志竟公开撕毁，表示反对，对士兵高呼口号，并发表了许多违反党的政策的意见。一部分军官只愿拉队伍打土豪，捉肥猪，满足于有肉吃，不愿意做艰苦的工作、发动群众搞暴动，个别的甚至蓄意拖抢潜逃。我们对这些错误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达到教育的目的。对有的干部作了留党察看、撤销职务的处分，以后这些同志都改正了错误。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党的威信，大队以上都设有党代表，和军官一同工作。此时，虽然桑植农民斗争的情绪同湘西各县相比最为高涨，但因家族观念非常浓厚，过去没有一点组织和教

育，受豪绅、土匪的压迫又最厉害，一点不敢反抗，所以不容易被发动起来参加斗争，加上党的组织一点基础也没有，单靠外来的同志对农民宣传很不够，因此，桑植的农民运动竟然没有做好。

7月初，湘西特委通告我们南下牵制敌十四军向湘东红军的进攻，为此我们决定南下到石门西北乡去发动群众搞暴动，拖住敌人。但在红军开动时，有人企图拖枪潜逃，前委为了严申铁的纪律，决定将拖枪潜逃的最坏的首要分子执行枪决。此后官兵才知道军纪是不可违抗的。至8月中旬，红军才进到石门西北乡的中心区域——磨岗隘。

在此之前，石门党的组织曾在南乡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并在湘西特委的领导下，建立了以大浮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但在强大的敌人的围攻下失败了，党的组织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红军到达石门境内，前委即与石门西北委的负责人曾庆轩、谭苏、吴协仲、郭天民等同志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决定：（一）以磨岗隘区为石门西北乡暴动的中心，在磨岗隘的四周如泥沙、镇街、子良坪、皂角市、石黄厂、石门垭等处，在最短期间恢复并发展党的组织，同时公开号召农民起来暴动；（二）暴动起来之后，立即在磨岗隘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割据西北乡，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三）同石门南乡的新安、合口等暴动区域联合起来，向石门县取包围形势，进而夺取石门县政权，尔后向桃源、常德发展。但由于西北乡同志的畏惧，群众没有很好地发动起